



# 试论大运河在徽商兴盛中的作用和影响\*

余敏辉

**摘要:**徽商与大运河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者之间是一种双向良性互动关系。徽商能够称雄商界300年,离不开大运河这条流淌千年的黄金水道的丰厚滋养。大运河不仅促成了徽商由地区性商人发展为全国性商帮,而且促进了徽商与外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促使了徽商精神由开拓创新转向开放包容。因此,与其说徽商让千年大运河奔流不息,不如说是大运河成就了徽商宏图伟业。

**关键词:**大运河;徽商;徽商文化线路;徽商精神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5-0113-09

最近有学者撰文指出,大运河(中国大运河简称,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让徽商“从边缘地区走向城市中心”,且“只有走出封闭隔绝的连绵群山,来到大运河这个大舞台,徽州人才大有作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sup>[1]</sup>。我们认为,徽商与大运河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果说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的大运河昔日的辉煌与荣光有徽商的贡献,那么被誉为“明清中国第一商帮”的徽商之所以能够称雄商界300年,横行宇内,富甲天下,更离不开大运河这条流淌千年的黄金水道的丰厚滋养。

## 一、大运河促成徽商由地区性商人发展为全国性商帮

王世华曾概括徽商特点,经商人数多、商业资本大,特别强调其活动范围广,是一大块(长

三角)、两条线(长江、运河),星星点点遍全国,还涉足海外,认为徽商深耕长三角并通过长江、运河融入中国和世界<sup>[2]18-23</sup>。在一定程度上说,确实是大运河成就了徽商在明清数百年间执商界之牛耳,因为“南来北往的徽商正是在这条大动脉沿线的市镇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sup>[3]33</sup>,甚至有学者以“大运河,大商机,徽商肇始”<sup>[4]3</sup>为题来展开论述。

(一)大运河起点——杭州,是徽人外出经商为生,走徽杭、闯天下的第一站。

通览徽商发展史,水运始终是其主要运输方式,根本原因除了成本低廉,可装载大宗货物,内河航运风险较少之外,还在于徽州通向外界水路交通尤其发达,而其中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是新安江下游)航线无疑是徽商走出封闭落后山区,走向百舸争流、生机勃勃大运河,驻足于运河沿线城市的一条最主要交通线路。这是因为,自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sup>①</sup>起,钱塘江就形成接运河、通大海、纳百川的宏大格局,而

收稿日期:2019-12-3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安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AHSKZ2018D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敏辉,男,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大运河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安徽淮北 235000),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安徽历史文化研究。

杭州作为大运河起点,地处钱塘江入海处,又与徽州一山(天目山)相连、一水(新安江)相通,且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加之物产丰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sup>[5]175</sup>,很自然成为“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sup>[6]卷7</sup>的初始地。

关于徽商形成于何时,其中有一说是始于南宋,而这个立论依据或多或少与大运河有关联。一是随着政治中心南移,以临安(杭州)为中心的运河网络<sup>②</sup>和漕运体系,已然成为“南宋都城临安的生命线”<sup>[7]</sup>;二是徽州作为畿辅之郡,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徽州母亲河——新安江在杭州与大运河汇合,把徽州与外界紧紧连在一起,而且营建新皇宫甚至新都城要大兴土木,广造楼宇,而徽(州)、睦(州)“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sup>[8]109</sup>,特别是“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sup>[9]114</sup>,更是蕴藏着巨大商机。可见,正是新安江、大运河承载着徽商的财富和梦想流向了远方,助力他们从明清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铸就了“徽商”这块享誉中外的金字招牌。

**(二)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和江北运河所在地——长三角,成为徽人求利四方、闯荡商海的主战场。**

如果说宋室南迁杭州为徽商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更为幸运的是离徽州不远处就是明清时期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三角。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膏腴之地,原本就是河流纵横,湖泊棋布,后来又有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江北运河与之相联通,已形成了内河水运网络最为密集之地,加之徽州深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两地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徽商在这里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有极大优势。

有大量记载表明,长三角是不甘于清贫、勇敢地“走出去”的徽商经营最早、资本投入最大、经商人员最集中、生意做得最为红火的区域,主要包括淮安、苏州、扬州、杭州、常州、湖州、南京、上海等城市,以及邻近的吴江、仁和、仪征、嘉定、桐乡、平湖、邗江、如皋等县乡集镇。可以肯定的是,徽商能够扎根长三角,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到四面八方,主要凭借浙东运河、江南运

河、江北运河与外地互通有无,把本地出产的食盐、茶叶、木材、丝绸、棉布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国各地,又从外地源源不断地运来粮食等,大运河无疑成为徽商的利润渊藪所在。正是由于有了大运河这条运输最为繁忙的航道、长三角这个最为稳定的大市场,“徽之富民尽家于仪(真)、扬(州)、苏(州)、松(江)、淮安、芜湖、杭(州)、湖(州)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sup>[10]卷2</sup>,民谚“无徽不成镇”就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徽商在这一区域的重要影响力。正是包括运河运输在内的交通便利、区位优势、市场发达,长三角既是徽商最主要、最活跃的经营场所,又是经营获利的最主要区域,当然还是最为集中的侨寓定居之地,可以说没有长三角就不会有徽商的崛起;反之,徽商也成为长三角兴起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大运河水运网络——贯通南北,承西启东,成就了徽人“商之地海内无不至”的盛况**

虽说雄起阡陌、名振四方的徽商奉行“行商坐贾,并行不悖”的经营理念,不过大多数都把长途贩运贸易视为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而徽州行商主要依托五条商业运输路线来进行商品贩运活动,其中“第一由新安江泛舟余杭,连接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第二是横贯东西的长江”<sup>[11]40-41</sup>,这也就不难理解运河沿线、长江两岸的许多城镇恰恰是徽商聚集之地。

其实,无业不营、无商不经的徽商,除了控制长三角和长江沿线外,还沿着山东运河继续往北拓展扩张,黄淮海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徽商活跃的身影。且不说淮安“布帛盐鹺诸利藪,则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sup>[12]卷1</sup>,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sup>[13]289</sup>,也不说“天津县有邻近海港的便利,徽州商人多取道海运往返贩茶”<sup>[14]</sup>,“北京歙县会馆的建立,可以看作徽商成帮的标志,也是徽商群体心理整合完成、徽州商人文化形成的标志”<sup>[15]9</sup>,更不说“顺着大运河,徽骆驼把生意往北一直做到关外”<sup>[16]190</sup>,单是徽商拥有“中国十大商帮之首”“钻天洞地遍地徽”“徽商遍天下”“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典”“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等赞誉就足以说明一切。可见,正是得益于在经商处世中形成

的独具特色的开拓创新精神,又与大运河这条国家漕运路线及商路网络结下了不解之缘,才创造了徽商富可敌国的神话。

## 二、大运河促进徽商与外界 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轮船、铁路、公路等近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人们外出经商主要依靠水路,陆路也大多是依附于河道岸边。大运河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是南北通商的唯一河道,又从中国最富饶的地方流过,它就像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一条生命线,如“千帆竞发为漕粮”就曾是运河上一道让人震撼的风景。如果把这条被誉为“国之命脉”的大运河称作历史之河、文化之河、财富之河的话,那么徽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是重要参与者、积极推动者,更是最大与最直接的受益者。

一方面,徽商通过大运河这条水运大通道,迈开经商步伐,左右逢源,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

如果说晋商崛起得益于“极临边镇”,楚商兴旺源自“九省通衢”,那么徽商繁盛则和大运河密切相关。

徽商崛起之初,无论沿新安江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到达杭州,进入长三角,还是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顺流而下至南京、镇江、扬州,都充分发挥了大运河这条水上运输大通道的独特作用,把徽州土特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墨、茶叶等辗转运往全国各地。当然,徽商也从外地运回徽州本地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等。

徽商兴盛以后,随着自身商业地位的提升,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已“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以后逐渐发展到以‘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sup>[17]309</sup>,但仍然要依靠大运河这条南北货物对流的运输线,捕捉商机,主动出击,抢占市场。

虽然对于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做到“其货无所不居”<sup>[18]卷10</sup>,且“天下都会所在”,“多新安人也”<sup>[19]卷13</sup>。但是他们是以盐、茶、木、质铺(典当业)四者为大宗,而其中与大

运河最密切的莫过于食盐。向来有着“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sup>[20]卷54</sup>之说的淮盐,以产量高、质量好在明清时期获得南方消费者的喜爱,其产地主要在今苏北沿海地区。由于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淮阴、淮安一带的王家营、清江浦航运便捷,运输量大,正常情况下畅通无阻,徽商就是凭借“从扬州、王家营、清江浦等沿运城镇可以通过发达的内河水运将食盐运往各地”<sup>[21]</sup>的优势,取得了食盐市场垄断地位并使之成为徽商经营的龙头行业,声势煊赫,以至于“近几百年来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sup>[22]2</sup>,正如徽人自述“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sup>[23]卷54</sup>,盐商很自然成为徽商的中坚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康雍乾时期“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sup>[24]卷1</sup>,盐业对于徽商手眼通天、四海称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徽茶是徽商经营的大宗商品之一。茶业甚至在近代取代了盐业成为第一大行业,它也离不开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的有力支撑。黄山自古好山好水出好茶,量多质高,品种齐全,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徽商贩茶出山重要路线有三条,其中第一条线路就是通过水路运输到京津地区。他们先将茶叶转运至长江,再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至通县(今通州)上岸,进入北京。其实,徽茶在北方以及运河沿岸城镇的行销都要依靠大运河来帮助实现。凭借这条北运路线,徽商把徽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业兴财旺,如清乾隆年间歙县商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就有7家,茶商各字号166家,小茶店有数千家。

与徽茶并称为“人民命脉所寄”<sup>[25]563</sup>的木材贸易,是徽商发展最早、衰落最迟的支柱行业之一,“以其货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sup>[26]卷4</sup>,和大运河也休戚相关。不可否认,徽商木材生意主要依靠长江水系进行,其中心首推南京、芜湖;其次则为镇江,主要原因是“沿江东下的木材或由此进入江南运河,销往苏松等府,或由此渡江至瓜州,沿运河北运”,而杭州能成为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曾在候潮门外成立“徽商木业公所”,又是因为“徽州及浙江西部山区所产的木材,都通过钱塘江水系运集于此,除供当地留用之外,都经由运河、黄浦江等水道运往嘉兴、苏州、松江等处销售”<sup>[27]180</sup>。可见,徽州木商是长三角重要

供应商,靠贩运木材发迹起家的徽商很多,如婺源西冲俞氏就是其中代表性家族之一,以致民间流传“盐商木客,财大气粗”的说法。

此外,自明代中期起,徽州布商势力日益雄厚,他们是包括长三角在内的运河沿线城市中“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当年“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临清等处,都有许多徽州布商从事贩运活动”,如明末清初,家产百万徽商吴逸公就曾“为米布于运漕”<sup>[28]</sup>457-458。

另一方面,徽商通过大运河这条商业大动脉,秉承“贾而好儒”之风,纵横捭阖,打造了一条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徽商文化线路。

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sup>[29]</sup>440,是一个极有文化自觉的商帮,在商业上创造奇迹的同时,在文化上也书写了辉煌,可以说是古代儒商的典范。伴随着悠悠运河水长流,敢于引领时代潮流的徽商,在开创运河商业网络的同时,对运河流域这一徽商主要活动区域的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还留存着不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线路作为文化交流的空间廊道,大运河不仅是一条壮观自然风光带,也是一条亮丽的文化走廊,更是一条见证徽商文化灿烂的“徽商之路”,它不仅“代表着徽商奋发进取的人生里程”,而且“代表着儒家思想接受商业文明的趋于开明的转型旅程,代表着中国农耕文明后期,重农轻商价值传统被局部打破”<sup>[30]</sup>。虽然徽商文化线路并非单纯的沿着大运河从南到北,但总体而言是以线状行进,然后辐射、发散为网状分布。考其情形大致如下:

其一,如果撇开徽商文化线路的启程之旅:新安江—徽杭古道,及其出发之地——徽州不说,仅就大运河这条最著名徽商文化线路而言,杭州和北京分别是其起点和终点。这两个位于大运河的南北两端、一脉相牵的城市,是徽商大运河文化线路的创造者,也是见证者和受益者。

杭州。同属于新安江流域的徽州、杭州渊源颇深,这有徽州和杭州共饮一江水(新安江)的缘故,也有“徽杭古道”<sup>③</sup>带来了联系紧密,更主要的是“人间天堂”杭州是距离徽商最近、最方便的淘金地,“徽州的丝绸商、木商、盐商都在

杭州拥有极大势力”<sup>[31]</sup><sup>[32]</sup>。此外,明末清初张小泉(黟县人)逃难至杭,揉淬了浙江龙泉钢的刀、剪获得大发展,张小泉剪刀已成为闻名遐迩的“五杭”(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产品之一;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绩溪人),是在杭州演绎了他的政商传奇。当然,徽商在把杭州作为重要经商据点并推动这座城市走向繁荣的同时,杭州也留下了徽商带来的深厚的徽州文化印记,如“徽州塘”“徽州弄”“小江村”等地名的出现,又如明代杭州戏曲中的徽腔就非常盛行。

北京。且不说运河通达到京城,数百年来流传着“北京城是漂来的”这句老话,单就明清两朝建都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就可想见运河漕运繁华的景象,以及运河之上、北京城中徽商奔波忙碌的身影,如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sup>[32]</sup>357,据说北京典当行就流行徽州方言。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歙县、休宁、绩溪、黟县、婺源都在北京设立了会馆,其中最早的是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创设的歙县会馆,这些会馆既是徽籍商人集结之所,也是徽籍官僚、名人云集之处,自然也是展示和推介徽商文化的重要窗口。此外,俗话说“商路即戏路”,很多徽商对戏剧情有独钟,走到哪就将徽戏带到哪,以至于有“没有徽州商人,就没有徽州戏”之说,如当年从扬州出发,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轰动一时的“四大徽班”进京献艺,就为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种——京剧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徽班能够进京演出并占据北京戏曲舞台,是与徽商经济上提供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没有徽商就没有徽班”或许说的很有道理。

其二,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江北运河是徽商大运河文化线路最为靓丽的风景线,其中分布着扬州、淮安、苏州等重要节点城市。对于沿线城市而言,大运河与之血脉相连、唇齿相依。如果把大运河比作一串闪闪发光的项链的话,那么沿岸城市便是这串项链上的璀璨明珠,而扬州、淮安、苏州无疑是其中最耀眼也是最明亮的。

扬州。都说扬州繁荣以盐胜,而“徽州人在扬州最早,考其年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

实徽商开之”<sup>[33]</sup><sup>326</sup>。由于认识到大运河对徽州盐商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加之扬州又是最适宜享受生活的去处,这里自然成为徽州移民的最佳目的地。伴随着大批徽商涌入扬州,垄断两淮盐业经营,积累巨额财富,他们不仅参与城市建设,还毫不吝惜地兴办教育文化事业,慷慨捐资筑桥修路等各项公益事业,积极投身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特别是兴建园林、宅第、会馆、书院、街巷、宗祠等,直接促成了“扬州以园亭胜”<sup>[34]</sup><sup>103</sup>局面的形成。徽商大多“商而兼士”,敬重风雅,讲究旨趣,极力招延四方才俊,如明代徽商汪新(休宁人)“既雄于贵,又以文雅游扬缙绅间,芝城姜公、金公辈名儒巨卿皆与公交欢”<sup>[35]</sup><sup>卷6</sup>;清代盐商代表江春(歙县人)广交天下名士,当时的一流学者如杭世骏、戴震、郑板桥、金农等都与他有交往;徽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祁门人)济人利物,倾接文儒,组织诗社,刻印典籍等,修建小玲珑山馆,“四方人士闻名造庐,授餐经年,无倦色”<sup>[36]</sup><sup>序</sup>。徽商还经常与“扬州八怪”进行切磋和交流,并提供了自由创作空间和舒适生活条件,“使他们的创作激情得以焕发,终成中国艺术史上耀眼的奇葩”<sup>[37]</sup>。反之,“这座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的城市给徽商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事业土壤和世俗归宿”<sup>[38]</sup>。

淮安。明清时期,“漕政通乎七省”<sup>[39]</sup><sup>卷8</sup>的淮安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漕运枢纽、盐运要冲,在鼎盛时期曾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有大量徽商长期定居于此。他们不仅结交官府要人,结好文人学士,积极办公益慈善事业,而且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殿阁,别具一格的徽派民居、徽派园林鳞次栉比,至今犹有不少遗存,如曲江楼、荻庄就颇负盛名。特别是徽州盐商对淮安饮食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作为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重要支撑的淮安菜,它的风靡一时就得益于徽商“侈饮食”的强有力推动。遥想当年,崇尚侈靡浮华生活、挥金如土的徽商,千方百计延揽名厨,搜集奇珍异品,以满足奢侈的口腹之欲,正是他们追求味觉盛宴,促成了名气极大的“淮菜三全席”(全鳝席、全羊席和全鱼席)的出现,而追求新奇风味,又助推了蟹黄汤包、平桥豆腐等淮扬名菜的形成。

苏州。地处运河之滨的“江南首郡”苏州,自古以来就与徽州联系紧密,“新安六邑多懋迁他省,吴门尤夥”<sup>[40]</sup><sup>卷18</sup>,徽商中很多茶商、布商、粮商就集聚于此,可以说苏州的富庶繁华徽商厥功至伟,特别是在建筑、饮食、人文等方面,徽商都对苏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苏州品牌也在徽州快速传播,如“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sup>[32]</sup><sup>606</sup>,以至于民谚有“生要生在苏州,死要死在徽州”之说。

此外,“徽人不蹲家,经营走四方”,深受徽商文化影响的还有北方的诸多运河名城,如“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sup>[41]</sup><sup>卷8</sup>的济宁;凭借地处大运河“腰脊、咽喉”地位,“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sup>[42]</sup><sup>923</sup>的临清;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sup>[43]</sup><sup>257</sup>的聊城等,都是徽商的辐辏之地,当然也是大运河徽商文化线路的重要支点城市,兹不再赘述。

由以上可见,徽商文化与运河文化交融互动,在双方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徽商文化与大运河文化是互动共生关系。

### 三、大运河促使徽商精神由 开拓创新转向开放包容

论及徽商精神,胡适(绩溪人)曾说“要坚守徽骆驼、绩溪牛勤劳坚忍的本色”<sup>[44]</sup><sup>16</sup>,认为吃苦耐劳“徽骆驼”、敬业奉献“绩溪牛”是徽商独有的精神特质,后人也由此常常把徽商精神比喻为“徽骆驼”精神和“绩溪牛”精神。

其一,徽商精神不仅仅是“徽骆驼”精神、“绩溪牛”精神,徽商精神应该是开放的、多维的、立体的,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如王世华教授把徽商精神概括为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sup>[45]</sup><sup>191-217</sup>。又如刘伯山研究员将徽商精神概括为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不怕挫折、执着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不辞劳苦、克

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sup>[46]</sup>。

其二,虽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野,可以总结凝练出诸多有理有据的徽商精神,但随着时代变化徽商精神不断丰富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就历史进程和本质特征来说,徽商一开始,爱拼会赢、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更好地体现出一种开拓创新精神,它是徽商文化的灵魂;后来兼济天下、审时度势、诚实守信、同舟共济,则更多地展示出一种开放包容精神,它成为徽商文化的基石,而这种转向的原因则和徽商从相对狭隘封闭的大山走向广阔的、流动的、开放的大运河有关。也可以说,是大运河在客观上培育了徽商心态的开放性和文化的多元色彩,增添了他们通达、兼容的胸襟和气度,使得徽州“山文化”与“水文化”有了完美互动融合,合奏演绎出一曲华美的乐章。

#### (一)开拓创新是徽商崛起的不二法门

促成徽商别开生面,异军突起的原因有很多,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创业者必备的思想观念大解放,以及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勇往直前的锐气和百折不挠的韧性。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徽州自然环境造就。一方山水造一方人,造一方文化。徽州地处皖南,“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隘”,且“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sup>[47]卷1,卷2</sup>,山多地少还不适合耕种,人口增长又较快,“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sup>[48]卷1</sup>。由于地处“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贫瘠山区,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人,不得不放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耕老路,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以贾代耕,求食四方”的经商谋生致富之路,正如顾炎武所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sup>[49]卷32</sup>。可见,不开拓就无以生存,不创新则难以发展,仅靠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这迫使徽人只能外出经商。穷则思变,徽人必须走出去,诚如徽州谚语谓“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这是徽人活命的最好选择。当然,如前文所述,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也成为

徽商孕育发展的一个原因。

其二,徽人移民基因使然。自汉末至唐宋,主要因战乱等原因,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很多中原世家大族举家南下迁徙到自古为山越族居地的徽州,因此徽人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有着一种在生存压力下养成的拼搏进取精神,这其中既有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正是徽州移民这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使得徽商特别富有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如他们不为正统思想所束缚,能够冲破封建的藩篱,打破抑商的禁锢,因地制宜、因时变通,走出一条“寄命于商”的新路;“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逝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sup>[6]卷1</sup>,开辟了比狭小徽州本土更为广阔又深邃的事业天地,形成了所谓的“小徽州”和“大徽州”<sup>④</sup>局面。重义诚信、有道经营,把“贾而好儒”这一徽商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及兼收并蓄、广纳博采,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地域文化之一的徽州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徽商在经商之地侨寓现象相当普遍,在16世纪以后徽州又成为一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sup>[50]225</sup>。不畏艰难,锐意进取,敢于走出去,不辞山高路远,不怕背井离乡,这是徽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其三,徽商致富欲望驱动。史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sup>[51]卷下</sup>,说的正是“驴上徽州,不死不休”的徽商对财富的强烈渴望,当然也隐含着他们在不断探索着经商成功之路。虽然徽人很多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但他们大都能不甘困顿、不畏艰苦,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任,毅然决然地走出深山,舍亲离家,闯荡商海,过着远离父母妻小的游子生活,“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sup>[6]卷1</sup>。其实,行商坐贾几十年,“一世夫妻三年半”的徽商,在他们“好别离”的背后,既有对投身商业一生无悔的执着和追求,也有其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外奔波和打拼的无奈,正如徽人感叹:“嗟夫!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sup>[18]卷10</sup>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徽商很快衰败的主客观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丧失了早期徽

商的开拓创新精神,晚清以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过着纸醉金迷,“不思祖业多艰苦,混洒银钱几时休”生活,而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徽商退出历史舞台应在情理之中。

## (二)开放包容是徽商兴盛的独门秘诀

助推徽商一枝独秀、独领风骚的原因也很多,他们走南闯北,感悟良多,而归根结底一句话,那就是精进事业必须拥有宽广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除了徽商把诚实守信视为比金钱更宝贵之外,还突出表现在其他三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家国情怀。“徽人不呆家,经商走四方”,足履天下、四海为家的徽商,在奋斗历程中,他们肩负起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且不说尚存有争议的明中后期参与抵抗倭寇侵略这件事,就以他们早期不辞劳苦运粮输边,以及近代以来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来说,无不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此外,除乐善好施、赈灾济贫外,徽商还热衷修桥铺路、开办学堂,尽可能造福一方百姓、尽一份社会责任。

其二,敏锐的市场眼光。徽俗中有“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之说,意指走出家门、闯荡四方的徽商,不囿成见,以开放的姿态、开放的胸襟,把目光瞄向外,把经营重点放在外,哪里有生意就哪里去,正如徽州学者金声所说:“尽天下通都大邑及穷荒绝徼,乃至外薄戎夷蛮貊,海外贡朔不通之地,吾乡人足迹或无不到。”<sup>[52]卷7</sup>正是因为徽商善于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开阔的眼界看世界,以开放的精神走出去,才创造了“徽商之名闻天下”“无徽不成镇”的煊赫业绩。

其三,和协的经商模式。徽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因为宗族、同乡观念重,徽商往往呼亲唤友,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形成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徽商从小就知道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合作共赢,抱团取暖,同舟共济,这也就不难理解徽商为什么宗族制度特别牢固、宗法观念特别强烈了。

## (三)大运河是徽商精神由开拓创新走向开放包容的“催化剂”

或许可以这样说,大运河有力推动了中华

民族结束南北分离的局面,中国也从此走向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交融的时代;或许还可以这样认为,大运河既记录中国历史文化写不尽的厚重、壮美和辉煌,也见证了徽商“崛起—兴盛—衰落”的曲折发展过程。

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作为明清时期重要的商运路线之一,它不仅是一条流金淌银的财富之河,还是一条千年流动的文化之河,由北到南贯穿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六大文化地区,不仅吸纳了运河城市各具特色的民俗人情,而且还融汇了园林、戏曲、工艺、饮食文化等。其实,作为“沟通内河各水系的纽带、贯通内陆与海洋桥梁、打开封闭文化走向世界的大门”<sup>[53]</sup>的大运河,在成为徽商的财富通道的同时,还以它的和谐共生、合作双赢、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主旋律,使徽商能在“故乡在他乡,他乡即故乡”观念支配下,博采众长,大量吸收包括运河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精华,加大了徽商精神在中华大地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其一,大运河推动了徽商精神的开放性。

大运河既是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又是文化融合的主纽带,更是对外交流的开放地。在徽商精神中,如开拓创新、吃苦耐劳、诚实守信、敬宗收族、崇文重教、贾儒结合、乐善好施等,都明显具有山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特质,而其天下为怀的爱国情操、志存高远的远大理想、求同存异的宽广胸怀、刚健有为的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等,则无疑反映出运河文化的元素。正是以“生生不息的奋斗进取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协同精神、海纳百川的融合共生精神、忠义诚信的使命担当精神”<sup>[54]</sup>著称的运河精神与徽商精神交汇融合,彼此影响,相互作用,才使得徽商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八方之风气,最终成就了独具魅力的徽商文化,并成为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二,大运河扩展了徽商精神的兼容性。

商业是文化传播、交融的媒介。拿着“包袱雨伞”走遍天下的徽商,既传播了商业文化,实现了文化追求,又培养了商业智慧。他们“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sup>[55]卷15</sup>的经营之道,贾名儒行、利缘义取、利人利己的

经商追求,固然有儒家所倡导的诚、信、仁、义等道德规范,也有徽商从事运河贸易中汲取的智慧和经验,当然还包括一些深刻教训。如在延绵近两千公里大运河商路上,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民俗风情千姿百态,那么为确保运河之上商船平安到达目的地,徽商沿途既要规避各类航运风险,追求绝对安全可靠,还要与人为善,和气生财,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预防事故发生或控制损失影响;特别是在人生地不熟的运河沿线城镇进行商品交易,只有在“利己”基础上的“利他”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只有“诚信仁义”才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并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大运河增强了徽商精神的吸纳性。

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而徽商正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他们为徽州文化昌盛提供了经济基础。其实,徽商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文化体,徽商开风气之先,大胆走出去,积极引进来,不断发掘与大胆吸纳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精髓要义,以及运河城市经营管理的成功之道,并与运河沿线人民共同创造了古朴典雅的徽派建筑、蜚声海外的三雕艺术,以及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文学以及新安画派等。

综上,历史上大运河与徽商形影相随、唇齿相依,是一种双向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徽商助推了运河沿线市镇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大运河促成了徽商由地区性商人发展为全国性商帮、促进了徽商与外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促使了徽商精神由开拓创新转向开放包容。因此,与其说徽商让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不如说是大运河成就了徽商的宏图伟业。

#### 注释

①江南运河,又称浙西运河,为京杭大运河的南段。北起江苏镇江、扬州,绕太湖东岸达江苏苏州,南至浙江杭州。②南宋临安城外运河,除浙西运河(江南运河)外,还有浙东运河(又名杭甬运河),北起钱塘江南岸的杭州西兴古镇,向东南横穿绍兴、宁波两市,于镇海汇入东海,全长200多公里。③徽杭古道是古时联系徽州与杭州的重要纽带,西起安徽省绩溪县渔川村,东至浙

江省临安市浙基田村,全长50余里。④“小徽州”是指徽州本土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由于徽州人的出外经商、游学、做官,把徽州文化带到全国各地,因此对徽州文化研究必然涉及到徽州文化以外的地区,这就是“大徽州”的概念。

#### 参考文献

- [1]王健,瞿凌锋.大运河让徽商“从边缘走向中心”[N].解放日报,2019-11-20.
- [2]王世华.第一商帮[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3]朱小阳,丁修真.解码徽商丛书无徽不镇[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4]老亨.深商的精神[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
- [5]夏时正.杭州府志·序[M].济南:齐鲁书社,1996.
- [6]休宁县志[M].刻本,1685(康熙二十四年).
- [7]徐吉军.运河:南宋都城临安的生命线[J].文史知识,2014(12):18—24.
- [8]方勺,撰.泊宅编[M].许沛藻,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吴自牧,撰.梦粱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 [10]徽州府志[M].刻本,1699(康熙三十八年).
- [11]李琳琦.经营之道[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12]淮安府志[M].刻本,1685(康熙二十四年).
- [13]谢肇淛,撰.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14]张雪慧.徽茶行销及徽商茶叶活动考略[J].徽州社会科学,1994(3):28—38.
- [15]唐力行.试论徽商与徽商文化[M]//陆勤毅,主编.安徽文化论坛2013徽商与徽州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 [16]吴建春,主编.阅读徽州[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5.
- [17]刘建生,燕红忠,张喜琴.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
- [18]歙县志[M].刻本,1609(万历三十七年).
- [19]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0]两淮盐法制[M].扬州书局重刻本,1870(同治九年).
- [21]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J].安徽史学,2004(5):84—86.
- [22]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 [23]汪道昆,撰.太函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 [24](民国)歙县志[M].歙县旅沪同乡会铅印本,1937(民国二十六年).
- [25]刘汝骥,编撰.陶璧公牍[M]//官箴书集成.合肥:黄

- 山书社,1997.
- [26]婺源县志[M].刻本,1787(乾隆五十二年).
- [27]王德寿,主编.安徽文化概要[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 [28]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M].合肥:黄山书社,1993.
- [29]戴震.戴震全书:第六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5.
- [30]冬冰,张益,谢青桐.文明的空间联系:大运河、新安江和徽杭古道构建的徽商文化线路[J].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9(2):150-155.
- [31]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 [32]许承尧,撰.李明回,等,校点.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 [33]陈去病,撰.五石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34]李斗,撰.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
- [35]休宁西门汪氏宗谱[M].刻本,1652(顺治九年).
- [36]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M]丛书集成初编本.
- [37]卞利.无徽不成镇: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城市发展[J].社会科学,2011(1):154-159.
- [38]李洁,陈跃.扬州:徽商文化线路的顶点[N].扬州日报,2009-04-15.
- [39]淮安府志[M].刻本,1884(光绪十年).
- [40]朱筭,撰.小万卷斋文稿[M].重刻本,1885(光绪十一年).
- [41]济宁州志[M].刻本,1673(康熙十二年).
- [4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甲编[M].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30.
- [43]山东省聊城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聊城市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9.
- [44]胡适.学问与人生:胡适四十自述:评注本[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
- [45]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 [46]刘伯山.徽商精神[N].安徽日报,1999-05-13.
- [47]罗愿,撰.新安志[M].刻本,1707(康熙四十六年).
- [48]休宁县志[M].刻本,1607(万历三十五年).
- [4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四部丛刊本.
- [50]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编.情缘江南 唐力行教授七十华诞庆寿论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 [51]祁门倪氏族谱[M].刻本,1876(光绪二年).
- [52]金声.金忠节公文集[M].刻本,1891(光绪十七年).
- [53]王健.大运河的精神品格和时代价值[J].群众,2018(3):31-33.
- [54]孙杰.大运河精神是大运河文化的集中体现:大运河精神的时代价值[N].北京日报,2019-05-27.
- [55]黟县三志[M].刻本,1870(同治九年).

## The Effec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Grand Canal in the Prosperity of Huizhou Merchants

Yu Minhui

**Abstract:** Huizhou Merchants shar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with the Grand Canal, both of which form a bidirectional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 The Grand Canal, a golden waterway that has flow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nourished Huizhou Merchants and boosted them to the peak in the business circle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The Grand Canal not only propelled Huizhou Merchants to evolve from regional individuals to national business groups, but also converted the spirits of Huizhou Merchants from innovative to comparative turning through trad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the external areas. Therefore, it is more rational that the Grand Canal helps gain the great business achievements for Huizhou Merchants, rather Huizhou Merchants keep the Grand Canal running unceasingly for a million year.

**Key words:** The Grand Canal; Huizhou Merchants; Huizhou Merchants' cultural route; Huizhou Merchants' spirits

[责任编辑/周舟]